

曲園先生與三老刻石的一段淵源

王競雄
國立故宮博物院
書畫處

提 要

清末學者俞樾（1821-1906），自號曲園叟，世人尊稱為曲園先生，生平學術入清史儒林傳記載，推為清季經學大師。俞樾一生以讀書著述為寄託，著作多至四百餘卷，輯成《春在堂全書》。近人論其學術，以為其中《諸子平議》、《群經平議》、《古書疑義舉例》等書，均有功於傳緒古學，啓迪後人；至於治學駁雜，合校勘、訓詁於一書，時或臆斷古字通假，則難免有多而不純之憾。俞樾究心經學，平時留意篆書、隸書，對於漢隸尤為喜好。本文因此取其一瓢，以咸豐二年出土之〈三老刻石〉為重點，述介俞樾與漢隸的一段淵源。全文直接從〈三老刻石〉的出土與流傳入手，著重俞樾對〈三老刻石〉投注的心力，或可由此略見俞樾留心漢碑，兼在書藝方面也有所得。

關鍵詞：俞樾、三老刻石、金石史、漢碑、隸書

一、前　　言

晚清學者俞樾（1821-1906），自號曲園叟，世人尊稱為曲園先生，¹生平學術入清史儒林傳記載，推為清季經學大師。俞樾一生以讀書著述為寄託，著作多至四百餘卷，輯成《春在堂全書》。近人論其學術，以為其中《諸子平議》、《群經平議》、《古書疑義舉例》等書，均有功於傳緒古學，啓迪後人；²至於治學駁雜，合校勘、訓詁於一書，時或臆斷古字通假，則難免有多而不純之憾。³俞樾究心經學，平時留意篆書、隸書，對於漢隸尤為喜好。本文因此取其一瓢，以咸豐二年出土之〈三老刻石〉為重點，述介俞樾與漢隸的一段淵源。關於俞樾的生平，近人已有年譜成書，引述翔實，⁴在此不作重覆。俞樾個人尚有《曲園自述詩》之作，⁵屬於親筆自傳，亦值得細讀。本文直接從〈三老刻石〉的出土與流傳入手，著重俞樾對〈三老刻石〉投注的心力，或可由此略見俞樾留心漢碑，兼在書藝方面也有所得。

二、三老刻石的出土與流傳

東漢〈三老刻石〉立於建武二十八年（52）以後，因正文記有父、祖名諱忌日，祖又任官三老，故全名為〈三老諱字忌日刻石〉。歷來習稱為〈三老碑〉、〈三老刻石〉，乃因碑文起首為「三老」二字。（拓本見附圖）

1 俞樾，〈肅親王手書楹聯見贈賦謝〉其四云：「曲園衰叟已贊唐，辱荷謙尊愧不當。甘與子雲同寂寞，敢偕太史論文章。……」詩中第二句自註：「辱稱曲園先生」，見《春在堂詩編·十九》，收入《春在堂全書》（以下簡稱全書）（臺北：中國文獻出版社，1968），總頁3405。

2 如丁福保，〈疇隱居士自訂年譜〉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影印民國18年鉛印本，1998），分頁42，按語云：「高郵自創一派，專以形聲訓詁，校勘古書，於是千古沉晦不可解之文詞，循其例無不涣然冰釋。後來俞樾踵其後，……」；又如奚敏芳，〈俞曲園左傳學研究〉（臺北：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1），頁10，文云：「俞曲園學術淹博，著述繁富，弟子名家者甚夥，其弟子章炳麟及再傳弟子黃季剛皆為民初大師，傳承古文家派，為樸學之一脈，至今師弟傳衍不絕，則俞氏之學術影響可謂深遠矣。」

3 如張舜徽云：「樾自少時，即以著書二字橫於心中，刻刻以模擬王氏為念，貪多驚博……」，參見《清人文集別錄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2），卷19，頁526。

4 近人為俞樾作年譜，如徐激，〈俞曲園先生年譜〉，收入《民國叢書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9）第三編，76；鄭振模，〈清俞曲園先生樾年譜〉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7）。

5 俞樾曾經私下向宗源瀚（1834-1897）表示：「近作曲園自述詩，可得七言絕句二百首，有此一卷詩，則身後行述、擴中志銘皆可不必矣。」見俞樾，〈與宗湘文觀察〉，《春在堂尺牘·六》，全書，總頁3734。

三老之設置，⁶西漢高祖已然有之，負責鄉里教化工作。當時五十歲以上，德行操守為衆望所歸，方可入選為三老，有鄉三老、縣三老以至國三老等等區分。有關三老之史實，除見於正史之外，石刻文字以及漢代簡牘中，均不乏相關史料。⁷三老得免繇役，秩祿並無一定，其中高者或可達二千石，亦有受封為侯。不僅衆民尊敬三老，皇帝亦且尊禮如師，歲有恩賜。目前所見東漢石刻文字中，尚可見推崇三老德業之例，〈三老諱字忌日刻石〉亦屬於其中之一。

〈三老刻石〉全文二百十七字，以界格區分為五列：其左由上而下共計四列，每列文字四、五、六行不等；其右一長列，文字三行。由於出土時上方斷裂，石邊四周凹凸不整，無從認定其原有形制。若從正文格線區域看來，係屬長方形，高78公分，闊37公分；若合計格線以外區域，全高90公分，全闊45公分。〈三老刻石〉字徑大小並非一致，第三、四列較大，約2.5公分，其餘約1.5公分。書體為隸書，結體略帶扁方，微見波勢，尚留存篆書遺意。俞樾究心經學，長年留意碑刻，探求古義、斟酌文字，〈三老刻石〉釋文也曾經其審定。本章述介原石出土以及流傳的經過，先為〈三老刻石〉初步鉤畫一個輪廓。

清咸豐二年（1852），〈三老刻石〉在浙江省餘姚縣客星山出土，初為宋仁山訪得，旋即歸由周世熊收藏。光緒年《餘姚縣志》略載其事云：

浙東存石，此為第一。諸生宋仁山實始訪得此碑，稔周世熊有金石癖，偕之往觀。世熊既得其處，夜即獨乘小舟，載碑還。朱觀察朗然有記，敘獲碑事甚詳。⁸

此段記載刻劃入神，宋仁山廓然無私，以及周世熊獨自連夜載碑，彷彿就在目前。其中所云朱朗然記文，筆者迄未尋獲，縣志所載獲碑經過當本於此。朱朗然為朱蘭（1800-1873）長子，生平事蹟附見於《餘姚縣志》朱蘭小傳中，朱氏父子與俞樾為翰墨交，曾以〈三老刻石〉拓本贈送俞樾。⁹

6 今人據《周禮》考述三老之由來云：「三老，乃戰國秦漢時期對具特殊身分的鄉吏的專稱，蓋源於戰國時期之鄉老。」詳見陳平、王勤金，〈儀徵胥浦101號西漢墓《先令券書》初考〉，《文物》，1987年，1期，頁21。

7 石刻文字如三老〈趙寬碑〉、〈楊信碑〉、〈袁良碑〉，簡牘文字如1993年江蘇連雲港市尹灣六號漢墓出土木牘（編號YM6D1）正面記有縣三老、鄉三老員額。

8 （清）邵友濂等，〈餘姚縣志〉（臺北：張元傑影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光緒25年刊本，1974），卷16，金石上，分頁2-3，按語。

9 朱蘭，字久香，晚號耐庵，官至安徽學政，子三人：朗然、追然（1836-1882）、衍緒。同註8，卷23，列傳，分頁25，文云：「伯子朗然，字韜夫，……居父憂不復出，惟以文字自遣。自先秦逮晉唐名刻，蒐羅甚富，日課臨摹至十餘萬字，四體書並擅精能。工題跋，所品量多出人意表。」另參見俞樾，〈朱久香前輩輓聯〉，收入《春在堂楹聯錄存》，全書，總頁3755，俞樾附筆：「…曾以三老碑為贈，乃餘姚客星山中新出漢碑也。」

刻石出土之地客星山，又名陳山，位在餘姚縣東北，周世熊於山下嚴陵塢居住多年。周世熊，字清泉，浙江餘姚人，任官光祿寺署正，平時收藏古磚，深得其樂，既得〈三老刻石〉之後，為建竹亭加以維護。周氏曾有跋記敘述獲石經過：

先君子解組後，卜居邑之客星山下嚴陵塢，即微士嚴先生故里也。咸豐壬子夏五月，村人入山取土，得此石平正，欲以甃墓，見石上有字，歸以告余。余往視，碑額斷缺，無從辨其姓氏，幸正文完好，共得二百十七。因卜日設祭，移置山館，建竹亭覆之。¹⁰

若將周氏所記與《餘姚縣志》相互參核，可以確定刻石出土時，上額已經斷缺，正文二百十七字幸未損傷。

其時太平軍在洪秀全領導下，已於咸豐元年（1851）起事，湖南、湖北、安徽、山東諸省，陸續受到紛擾。咸豐八年（1858），太平軍入侵浙江，繼於辛酉年亦即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，攻陷餘姚、紹興諸地。〈三老刻石〉乃遭戰事波及，被太平軍充當籠石，其薰灼受損情形周世熊亦有記載：

辛酉之亂，賊火吾廬，亭相去稍遠，得不毀。事平，碑仆於地，旁甃漢晉磚數十，如竈突然，蓋賊以用作炊者。石受薰灼，左側黔黑，而文字無恙。¹¹

故知〈三老刻石〉出土之後，先免於築墓再利用，復度過太平軍戰火之劫，文字依然完好，由周世熊繼續寶藏。

同治五年（1866），魏錫曾（?-1882）與友人親訪周世熊，椎拓三老碑。¹²魏氏不免感歎，昔日承平之際未加留意，兵火之後始跋涉訪拓。魏氏此行在周宅停留五日，探出刻石文字出於椎鑿之法，字口深凹，椎拓時必須同時施用小拓包，始能掌握細微之處。魏氏《績語堂題跋》詳記此行經過，並云：

方出土時，周君命工拓百十紙，但存形模。自余拓後，轉語碑工張文蔚，渠如法爲之，近拓乃朗晰勝前矣。¹³

10 (清)俞樾，《春在堂隨筆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影印清同治年間刊本，1968)，卷2，分頁5。

11 同註10，卷2，分頁6。

12 (清)魏錫曾，《績語堂題跋》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編》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9)，第三輯，冊38，總頁394，〈書漢三老碑後〉云：「主人聞其爲漢碑來也，甚喜。導入別室，拾級而登，有竹石之勝，則三老碑在焉。」

13 同註12，總頁394。

魏錫曾，字稼孫，浙江仁和人，與趙之謙（1829-1884）為知交，一生甘於淡泊，寄情金石，其與俞樾亦甚投合，曾以金石文字託請俞樾審定。¹⁴在魏氏諸人親訪椎拓之後，〈三老刻石〉漸有佳拓流傳，而進一步為人知曉。及至光緒十九年（1893），餘姚邑人著手重修縣志，¹⁵已將〈三老刻石〉列入記載，並註明「藏陳山周世熊家」¹⁶，可知此際刻石仍由周氏寶藏。

民國十年（1921），〈三老刻石〉輾轉流入上海，為商人陳渭亭所得。¹⁷日本人欲乘此機會高價向陳氏收買，事為姚煜（1868-？）、沈寶昌探悉。姚、沈二人均為浙籍，當時旅居上海，關注鄉里文物的動向，因此聯合西泠印社吳昌碩（1844-1927）、丁仁（1879-1949）諸人，設法籌募資金，挽回此事。其時印社一方面發布公啟，呼籲勿讓古物就此流失域外；同時在上海、杭州等地舉行書畫、印譜義賣，募集捐款，終於如願將〈三老刻石〉載回西泠印社。¹⁸為妥善長久保存刻石，印社為之闢建石室安頓，由社長吳昌碩書撰〈漢三老石室記〉，記載由來經過：

……不旬月而事集，以八千金歸陳氏，而載碑返諸浙。慮其久而復湮也，擇西湖孤山之陽西泠印社隙地，慎重度置，建室覆焉。……夫三老碑，東海片石耳，猶不忍其淪于異域，而圖永永保存之，矧有什百千萬于斯石者，而忍恝棄之耶！大呂陳于元英，故鼎返乎磨室，在人自為，匪石之不可轉也。鄉人士督予撰石室記，爰書此以誌國人。凡捐金贖碑，最六十五人，依漢石例，署名氏於碑陰。歲在壬戌閏五月既望。¹⁹

吳氏記文也刻石陳列三老石室中，²⁰為這段金石小史留下紀錄。

14 如魏氏書函俞樾：「錫曾近將所著金石萃編校文，先就王書周秦漢魏各卷，據所見揭本校正，粗為條例，終未盡一。俟將東漢各碑校有眉目，即寫本求正也。」魏函收入《袖中書·二》，全書，總頁5679-5680。

15 （清）邵友濂等，《餘姚縣志》，卷首〈重修餘姚縣志敘〉，頁1。

16 同註15，卷16，金石上，分頁1。

17 羅振玉，《雪堂金石文字跋尾》，收入《羅雪堂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文華出版公司，1968），初編二，總頁458-459，文末註云：「此石近為滬上陳氏購去，深冀其不入估舶也。」陳渭亭或作陳渭泉，本文據呂以春，〈漢三老碑拾零〉，《杭州大學學報》，11卷，2期，頁89。

18 當時募捐公啟有云：「夫保存古物，一人守之，不若與眾人共守之。今擬由我鄉人醵金以原價返諸陳君，仍歸此碑于浙，擇西泠印社隙地，建石室以復之。」收入吳東邁編，《吳昌碩談藝錄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203-204；另參見顧齋，〈印學話西冷——關於我對西泠印社社史的初步認識〉，《書法研究》，1983年，3期，頁17-36。

19 記文全文見吳東邁編，《吳昌碩談藝錄》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201-202。

20 〈三老石室記碑〉今存於西泠印社三老石室中，高120公分，寬53公分，民國11年刻。碑陽為記文，碑陰為捐資贖碑題名與收支賬目。見杭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，《杭州市志》（中華書局，2000），11卷，頁748。

三、斟酌三老刻石釋文

前已述及〈三老刻石〉出土之後，即由周世熊收藏。周氏陸續椎拓分贈同好，拓本日漸傳佈開來，於是不乏有心人加以考釋文字，或者為作題跋札記，探究刻石的文化義涵。據筆者所見有關著錄，（附表一）以蔣光煦（1813-1860）咸豐六年（1856）所刊《東湖叢記》為時最早。此時刻石出土不過數年，見者不多，書中尙以「餘姚山中漢人摩崖」為題，著錄釋文。蔣氏所以能夠先睹為快，乃因六舟上人釋達受（1791-1858）與周世熊往還，因此獲贈拓本。蔣氏同時認可六舟上人之見，推許〈三老刻石〉為兩浙第一碑。²¹

蔣光煦，字生沐，浙江海寧人，世居硖石鎮，家藏古籍書畫甚為豐富，有《別下齋書畫錄》記載世代收藏。由於無意科舉功名，蔣氏以校刊書籍為業，所刻別下齋叢書，有功士林，世稱精善希有。蔣氏與六舟上人相識於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，兩人一見如故，時以金石書畫切磋往還。²²因此蔣氏所成釋文可能出於好友參與商定，並非個人之見。當時金石考古蔚為風氣，〈三老刻石〉出土未久，自然成為好古之士關注的重點。蔣光煦所成釋文未得到全面認可，如傅以禮（1826-1898）直接評為「殊不足據」，於同治五年（1866）與魏錫曾重行釋文，收入《華延年室題跋》中。傅云：

近時趙撝叔續寰宇訪碑錄始存其目，蔣生沐東湖叢記並錄其文，惜叢記所釋多誤，殊不足據。爰與魏稼孫畧尹參互審定，另釋於右。²³

傅以禮，字節子，浙江紹興人，早年居住姚江，與趙之謙交誼深厚。傅氏究心晚明史學，同治六年任官福建，復參與武英殿聚珍本叢書校刻工作，以精審見稱士林。傅氏與周世熊亦屬舊交，因此獲贈拓本，商於魏錫曾。然而，在傅氏請商之前，魏錫曾業已留意此事，並託請譚獻（1830-1901）審定〈三老刻石〉釋文。據譚氏《復堂日記》所載，其事在同治三年（1864）：

21 (清) 蔣光煦，《東湖叢記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重印咸豐6年刊本，1967，書目叢編第16冊)，卷5，分頁31-33。

22 (清) 釋達受，《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》(北京：北京圖書出版社影印清咸豐年鈔本，1998)，頁449-450，文云：「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五十二歲。春仲，吳江翁君叔均大年遇訪。叔均精篆刻、工書法，徵君海邨先生之次君也。偕游紫硯雙峯，偶值蔣生沐廣文光煦於慧力寺西麓山房。蔣君收藏甚富，廣刊秘籍已盈三十餘種，一見如舊，相識頗極款洽。」

23 (清) 傅以禮，《華延年室題跋》(臺北：廣文書局重印清宣統元年餘杭俞人蔚排印本，1969)，卷中，分頁51-53。傅氏另作《有萬熹齋石刻跋》，亦加以著錄釋文，所記與《華延年室題跋》相同。

稼孫屬予審定餘姚周氏藏石漢三老碑文，漢人最重避諱，恐祖禰久遠，子孫或不知而誤觸。此碑當施於家廟之庭或堂，非墓碑蘊石比。²⁴

由此可知傅氏所成釋文，經過魏錫曾和譚獻兩人共同參與其事，²⁵又較蔣光煦推進一步。

俞樾與周世熊之間原無直接往還，由於經常託請朋友就便蒐訪碑拓，因此所得〈三老刻石〉拓本不止一本。除前述朱蘭父子所贈之外，宗源瀚（1834-1897）²⁶、如山（1815-1885）²⁷兩人，均曾以拓本相贈。俞樾作成釋文之後，復得見周世熊所作釋文和跋語，由於彼此所釋略有不同，乃於《春在堂隨筆》中加以逐字比對記錄，並且將周世熊跋語附載下來，其時俞樾已主講杭州詁經精舍。²⁸對於拓本的狀況是否清晰，俞樾並未記述，在金石益友彼此切磋之下，俞樾不但多讀多見，還有機會得見清晰佳拓。

本文前已述及魏錫曾親訪周世熊，椎拓三老碑，魏氏掌握到刻石的刀法和椎拓方法，詳細記載於〈書漢三老碑後〉一文中：

三老碑椎鑿而成，鋒從中下，不似他碑雙刀，故每作一畫，石膚坼裂如松皮，非細審原石，不能定爲某處字畫，某處泐痕。即佳手精拓，非用小墨團加撲數四，其凹陷之筆亦都不顯。²⁹

魏氏文中且加小字附註，進一步辨清碑文字畫種種細節：

小父「小」字，謁君「謁」字，次子盆「盆」字，君期「期」字，力射「射」字，嚴及焦「嚴、焦」字，不可識之「𠂔」字、「𩫑」字，及額間「𠂔」形，「副」下橫畫錐，歷歷可辨。諸家多有誤釋，由未見原石也。碑中「義」字、「及」字，右波但刻外匡，中不去空，與太室石闕前銘同。前人稱爲雙鉤，實則刻工取省筆耳。³⁰

24 (清) 譚獻，《復堂日記》，收在《叢書集成續編》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重印光緒十三年刊本，1991)，卷1，分頁23。譚獻，本名廷獻，字仲修，號復堂，浙江仁和人，曾主講經心書院。

25 傅以禮與魏稼孫爲金石交，相交近二十年，魏氏過世後，傅氏曾於秦度跋文中追念老友云：「…而今而後，孰與余共賞析耶，覩物懷人，曷勝於邑」。參見註23書，卷中，分頁50。

26 〈宗湘文太守書〉云：「……兩次獲陪座末，得聆緒論，榮幸無似，遲日再當趨謁。茲奉上三老碑脫本，又杭城坊巷圖，伏求察入。尊著之已刻者，如蒙賜讀，則百朋之錫矣。佇望佇望。皇恐皇恐。」收入《袖中書·二》，見全書，總頁5682。

27 〈如冠九觀察書〉云：「禹寺往生碑已搨來，頗有鍾太傅遺意，謹以三紙奉寄。三老碑多細凹，搨工不善，難以著手。餘姚令極力蒐羅，僅得舊搨二本，願與老兄分藏之。」收入《袖中書·二》，全書，總頁5682。

28 (清) 俞樾，《春在堂隨筆》，卷2，分頁5-6。

29 (清) 魏錫曾，《續語堂題跋》，總頁394-395。

30 同註29，見原文中小字註。

魏氏觀察入微，以上所記細節，成爲此後辨別原拓和翻刻的主要依據。³¹

魏錫曾此文作於同治九年（1870）二月十七日，文末並且提到俞樾向其索觀手拓：

近從俞蔭甫丈假觀春在堂隨筆，中及此碑，索觀手拓，黏綴之頃，憶當日情事如昨，因牽連記之，當訪碑遊記一則。³²

此時俞樾的兄長俞林奉養老母遊宦福建，俞樾因於同治九年正月前往探親，期間遂有機會與魏錫曾晤面，研究金石文字。事後俞樾書函魏氏，流露欣慰之情：

閩中小住，得接清談，兼讀非見齋金石文字，考訂之勤，蒐羅之富，一時無兩矣。僕此次來閩，除敬問老母起居外，不過冠蓋往還，酒食徵逐，真成一俗客。幸足下時相遇從，一雅可醫百俗也。³³

信中雖未特別提及魏氏手拓本，若將兩方面所記相互參照，可以推知俞樾此行見所未見，於〈三老刻石〉亦有所得。

除魏錫曾之外，俞樾的金石同好猶見有心人，如沈樹鏞（1832-1873）也訪得〈三老刻石〉精拓本，特別連同舊有釋文，函請俞樾審定。沈書云：

漢三老石刻，曩時所見皆甚模糊，故各家釋文多就意義所屬，揣度爲之。及前年得精拓本，有字甚明顯而不可識者，心甚惑焉。竊以此刻中鋒椎鑿，字體古拙可愛，惟文詞則朴野之至，殊覺費解。吾師既有藏本，必曾詳究其義。今以精拓之本并舊釋文，呈請鑒定，伏求指示疑義，俾得釋然於心也。³⁴

惜信中未明言精拓本和舊釋文出自何人。由於沈樹鏞於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病逝，可以推知這件信札不晚於此年。現將周世熊、俞樾、傅以禮三者釋文作成簡表，附於本文之後，比對之下可見三者的差距相當有限，（附表二）今日學者爲〈三老刻石〉作釋文，³⁵仍然引爲參考依據。

31 〈三老刻石〉有複刻本之說見於顧燮光（1875-1949）《夢碧簃石言》，顧氏謂複刻本出自周世熊，以應各方需索。此說出於傳聞抑或親見，有待求證。近人王壯弘曾目見拓本數十紙，發現確有複刻本流傳，於《增補校碑隨筆》中詳述辨別原拓、翻刻之法，其經驗亦相當可貴。

32 (清) 魏錫曾，《續語堂題跋》，總頁395。

33 俞樾，〈與魏稼孫〉，《春在堂尺牘·三》，全書，總頁3689。

34 〈沈韻初中翰書〉，收入《袖中書·一》，全書，總頁5672。沈樹鏞，字韻初，上海人，與趙之謙諸人爲金石交，《補寰宇訪碑錄》得以成書，即有賴沈樹鏞合作。趙云：「今茲成書則均初之力也。」。見趙之謙、沈樹鏞，《補寰宇訪碑錄》，收在《石刻史料叢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），乙編，卷首趙之謙記文。

35 如高文、永田英正，均引爲參考依據。

四、對三老刻石的體認

仕與隱曾經是俞樾生涯規劃思索的問題，如同許多讀書人一樣，俞樾一方面參加科考，為仕途作準備，另一方面卻嚮往單純的讀書生活。³⁶從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參加鄉試，至道光三十年（1850）考中進士，這段科考歷程長達十三年，期間俞樾曾因家計所需，先後在武林、新安等地授館為業，考中進士之後，得以步入宦途。起初一路順遂，咸豐五年（1855）即升任河南學政，未料咸豐七年（1857），竟遭御史彈劾試題不當，免官南歸。此後俞樾潛心讀書，講學著述，在人生的轉折點上邁出第一步。

南歸以後，俞樾有志於經學，留意篆書、隸書，多方面涉獵金石碑版以及磚瓦文字，紮實作學問的基礎。³⁷由於喜歡讀漢人的著作，俞樾曾將居所署名為「讀先秦兩漢書室」。³⁸對於漢代碑刻，俞樾自然是有心人，從以下這段〈駢隸〉前言，可以感受到他好之、樂之的喜悅：

班孟堅稱，大漢之文章炳焉，與三代同風。然漢人之文存留至今者，不敵唐人十之一二，其失佚多矣。自宋歐陽氏著集古錄，於是士大夫爭言漢碑，碑之出土者日益眾，而著錄者亦日益精，又自成爲一家之學。然世之人則徒喜其分隸之工，而未必知其文章之美也。余每讀漢碑，歎其古拙之中，沈博絕麗，湖樓無事，輒刺取其文，各以兩字相儻，譬猶閨閣門草、兒童聚沙，姑以爲戲而已。³⁹

俞樾浸潤漢碑，從考求字義，引證經史，到涵泳辭章聲韻，學習漢隸書法，可說是有其嚴肅的一面和輕鬆的一面。〈三老刻石〉出土之後，俞樾與金石同好切磋往還，隸定釋文，其探索的方向，可以進一步從治學的角度和書藝的角度來看。

36 俞樾早年授館新安，曾有詩題云：汪紫卿芳慶爲余畫一便面，柳蔭之下，因山爲屋，一人危坐其中，旁則積書如堵。噫！此境也，非余所深願而不得者邪。因爲長歌以酬其意，兼述所懷。見《春在堂詩編·第二》，全書，總頁3157-3158。

37 俞樾云：「雖然，余經生也，欲通經訓，必先明小學；而欲明小學，則豈獨商周之鐘鼎、秦漢之碑碣足資考證而已，雖磚文亦皆有取焉。」見〈慕陶軒古磚圖錄序〉，收入《春在堂雜文·續二》，全書，總頁2354。

38 俞樾記云：「予嘗署所居曰『讀先秦兩漢書室』，蓋漢人之書予皆喜讀之，而獨不喜讀王充之論衡。」見《春在堂雜文·續五》，全書，總頁2402。

39 俞樾在〈駢隸〉中列舉漢碑典雅辭語，如晚學、末生等百餘條，見《俞樓雜纂·第三十一》，全書，總頁1981。

(一) 治學的角度

俞樾《第一樓叢書》收錄研讀漢碑心得四十一條，《俞樓雜纂》中亦有〈讀漢碑〉一卷，兩者合觀，探討所及有〈開母廟石闕銘〉、〈衡方碑〉等二十七種碑刻。⁴⁰此外，尚有部分漢碑研讀心得，散見於《春在堂全書》，或者藉碑文探求字義考訂典籍，或者涉及漢碑文例以及隸體變易等等問題。俞樾的詮釋或考訂，雖然未必皆可採擇，⁴¹其用心漢碑已可略見一斑。對於〈三老刻石〉，俞樾思索的問題從考求立碑者、驗證碑文中涉及之年月干支，到碑文反映的漢代習俗等等，探尋所得，記錄於《春在堂隨筆》中。俞樾推斷〈三老刻石〉屬於私人立碑，乃是三老的第七孫邯所立：

詳其文義，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孫，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，以識祖、父名字，且存忌日。然祖及祖母忌日，有日而無年月，亦疏略矣。所引春秋之義，殆即穀梁傳，孔父不名爲祖諱之說，意其人乃爲穀梁之學者也。⁴²

對於立碑者邯俞樾解釋如上，至於立碑的年代俞樾未予設定。當時雖然一致認同刻石爲東漢之物，卻各有早晚不同的看法，如趙之謙、傅以禮認為石立於東漢初年，係根據碑文中忌日建武二十八年來判斷。繆荃孫（1844-1919）則以爲書法已見分書波磔，宜定在東漢末年。⁴³筆者贊同趙之謙等人的看法，以第七孫邯可能享有的年歲來推算，建武二十八年以後的七十年間，當屬可能立碑的時段。

40 兩者探究所及：開母廟石闕銘、北海相景君銘、石門頌、李孟初神祠碑、郎中鄭固碑、孔宙碑、楊統碑、衡方碑、楊著碑、孔彪碑、魯峻碑、校官碑、白石神君碑、封龍山頌、祀三公山碑、乙瑛碑、孔君墓碣、禮器碑、蒼頡廟碑、鄖闕頌、楊淮表記、繁陽令楊君碑、尹宙碑、鄭季宣碑、曹全碑、張遷碑、巴郡太守樊府君碑。略舉〈開母廟石闕銘〉爲例：碑文「福祿來攸，相□我君」：俞樾肯定王念孫之見，當爲「相宥我君」，以宥乃助之義。碑文「木連理於芊條」：俞樾不取畢沅、顧炎武之說，主張「芊」即「幹」之本字，其義爲木連理於枝條。碑文「神□享而鉛格」：俞樾主張從王念孫之說，當爲「神禋享而鉛格」。筆者按：俞樾可能未見及清晰拓本，若據日本二玄社《書蹟名品叢刊·四十六》，拓本較爲清晰，碑文作「神靈享而鉛格。」

41 如〈讀漢碑〉北海相景君銘條，俞樾謂景君實未就任益州太守，此說即未爲學者所採納。參見葉國良，〈東漢官宦冢墓碑額題職例及其相關問題〉，《石學叢探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17，註15。

42 (清) 俞樾，《春在堂隨筆》，卷2，分頁5。

43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金石文字目》，收入《石刻史料叢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），乙編，卷1，分頁13，文云：「趙撝叔以記中忌日均在建武年，附建武朝，然分書波磔，絕非東漢初年之物，移入漢末。」

俞樾研讀碑文，對文中「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，四月五日辛卯忌日」提出疑問，並且求證於汪曰楨（1813-1881），以為四月不得有辛卯：

越中一別半年矣，爲學日益，諒如所祝。尊著廿四史月日考已有成書否？

今有一二事輒求教于左右……又餘姚客星山有漢碑新出土，所稱三老碑是也，其文有云，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四月五日辛卯。據光武紀是年二月晦乙亥，四月有乙卯，則四月不得有辛卯，亦祈一核之，明以教我。⁴⁴

汪曰楨究心史學、算學，精於考求朔閏，⁴⁵其是否具體答覆俞樾，筆者尚未尋獲有關資料。今人高文注釋〈三老刻石〉亦曾觸及此一問題，所見和俞樾一致，也提出四月無辛卯日；高文復另據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，謂二十六日始值辛卯，指出兩者亦不相合。⁴⁶

在以上干支問題之外，俞樾嘗試進一步解釋，何以碑文中父母忌日尚有年月，而祖父母忌日僅存干支：

竊疑古人以幹枝紀日，不以初一初二紀日。其家相傳三老於庚午日死，祖母於癸未日死，相傳既久，忘其年月。民間不知歷術，安能推知其爲某年某月某日乎。⁴⁷

俞樾也對碑文中「提餘」、「持侯」均屬雙名有所解釋：

父歿於建武十七年，則九子之生，必有在王莽之世者。莽禁二名，而提餘、持侯，名皆二字，其亦有用漢臘之意乎。名字俱而備，姓氏竟不得詳，更當考之。又其文字有不可識者，姑作空圈記之。⁴⁸

上述俞樾探討所得，著重於碑文內容，尚未觸及刻石本身反映的文化義涵。關注此項問題的學者，各有不同的解釋。葉昌熾（1849-1917）提出刻石屬於「譜系」的看法，以為歷來石刻附載世系的現象，不止一例，〈三老刻石〉已具備譜系的性質。⁴⁹此說得到沙孟海（1900-1992）的認同，分析刻石分層題刻的

44 俞樾，〈與汪謝城廣文〉，《春在堂尺牘·三》，全書，總頁3684-3685。

45 汪曰楨，字剛木，號謝城，浙江烏程人，咸豐二年舉人，任官會稽縣學教諭。參見〈汪曰楨傳〉，收入閻爾昌，《碑傳集補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本，第122冊，1986），卷43，頁639。

46 高文，〈漢碑集釋〉（修訂本）（河南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3，註4。李慈銘也留意到此一問題，然誤訂四月十六日始值辛卯。是以高文附加按語：「十六日是辛酉，四月無辛卯日。《二十史朔閏表》：四月丙寅朔，則五日是庚午，廿六日始值辛卯，與碑史皆不合。」

47 同註42，卷7，分頁10。

48 同註42。

49 葉昌熾，〈語石〉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9），第二輯，冊16，卷3，總頁11914-11915。

形式已粗具譜表的體制：

舊俗重世譜，由來已久。商代甲骨即有連載世系專片，歷代碑傳之文，無不詳敘先系。世本原簡不可見，漢三老忌日碑分層題刻，粗具譜表體制。⁵⁰馬衡（1881-1955）則提出另一種看法，將刻石歸屬享堂之物，認為與畫像石〈戴父母忌日記〉均有祠墓的作用：

古之墓所，有建築石堂，中設神主，以為歲時享祀之所者。今所傳此等刻石，多為漢刻，且多有圖像。永元七年、延平元年、永建五年、建康元年各有一刻，並署食堂或石堂二字；尚有三老諱字忌日記一石（忌日皆在建武中）、戴氏父母忌日記二石（忌日皆在永初中），雖不言立堂，亦皆祠墓中物。⁵¹

馬衡的假設同樣合乎情理，卻需要較為充分的考古實物作為輔證。〈三老刻石〉出土時，上方已經斷缺，無從判斷原有形制。近年來漢代石刻續有出土，卻尚未見到與此相同的體式。

（二）書藝的角度

俞樾〈曲園自述詩〉提及免官歸里之後始學篆隸，⁵²其目標固然在於治學，⁵³本身愛好書法自然也是動因之一。在《曲園雜纂》中可以尋到相關線索，得知他的意向：

余甚喜漢人之字，甚不喜漢人之畫。凡漢人之字，雖至拙者亦覺其可愛，至漢畫之流傳於石刻者，不知其佳處安在。⁵⁴

從文中所用「甚喜」、「可愛」字眼，足以意會他對漢人書法喜愛的程度。

俞樾所處的時代，正值金石碑刻書法轉受重視的階段，揚碑抑帖的聲浪在書壇盪漾。俞樾無意參與論評優劣，從以下三件事例，卻可以肯定他傾心碑刻書法在法帖之上：

50 沙孟海，〈陸鳳石手鈔家譜跋〉，收入《沙孟海論書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426。

51 馬衡，〈中國金石學概要〉，見《凡將齋金石叢稿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影印本，1981），卷2，頁97。

52 （清）俞樾，《曲園自述詩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11。

53 俞樾〈馮伯淵考定文字議疏證序〉文云：「余自中州罷歸，壹意古學，始學為篆，研究許書，成考定文字議一篇，乃自為作篆計耳。吳下馮子伯淵，見而好之，遂條為作疏證。」見《春在堂雜文·補遺》，卷2，全書，總頁3035。

54 （清）俞樾，《曲園雜纂·三十九》，全書，總頁1625。

1. 因訪得唐碑，記文中慶幸自己有眼福：

嗟夫！浙東西漢石不可多得，唐碑已可寶貴。余於己巳歲游紹興，得見唐開成五年禹寺往生碑，惜自來金石家未及著錄，曾屬精舍諸生作詩以張之。今昌黎此碑，高出彼上，豈止什倍。余數十年訪求而不得者，今乃得之，不可云非眼福矣。⁵⁵

2. 光緒九年（1883）爲何澂《漢碑篆額》作序文時，透露碑帖優劣之見：

漢篆不可多見，欲觀漢篆者，不得不博求之於碑額，蓋漢碑諸篆額實秦篆之嫡派也。世人習見繹山傳刻之本，以爲秦篆初不如是，不知彼傳刻本結構僅存，神氣盡失，烏足以言秦篆哉。薛尚功所摹秦斤、秦權，其筆意居然可見，漢人作篆皆從此出，乃學秦篆非變秦篆也。惟其中間有參雜隸體者，此則時爲之矣。何竟山太守博學好古，篆隸並工，嘗裒聚其所得漢碑額，用雙鈎法摹而刻之，以印本寄余。余謂欲學篆者，宜各置一篇，以玩其用筆之法，勝於摹寫棗木傳刻之本萬萬也。⁵⁶

3. 有人持王羲之書蹟前來求辨真偽，俞樾的回應相當平淡：「余不能辨其真偽，亦不敢率題一語，留數日而歸之。」⁵⁷

畢竟俞樾的態度尙屬平和，沒有產生好此遂惡彼的對立心態。然而，俞樾並非始終平穩如一，在爲陶濬宣（1849-1915）作跳山訪古歌中，俞樾贊歎〈三老刻石〉之餘，不免情溢乎辭，認爲晉唐名蹟相形見絀：

吾浙從來少漢蹟，不圖迭出道光咸豐間。道光癸未始得跳山之石刻，咸豐壬子又有三老遺記出於客星山。……昭代崇古古乃出，一字真可當千鍾。三老古拙此奇恣，坐看晉唐名蹟皆羸孱。安得模拓百本或千本，庶不負君一日搜尋艱。⁵⁸

俞樾晉唐爲弱的看法流於主觀，在此無需贅言；至於「古拙」二字，自然是俞樾真實的感受。〈三老刻石〉雖然呈現隸書的點畫結構，結體或見方整，點畫波動之勢猶然蘊藉，尙存有漢篆方勁的氣息。相較於東漢後期分隸，結體扁方，點畫俯仰波發的態勢，各有異趣。不僅俞樾激賞這分古意，時人也察覺其中數字

55 (清) 俞樾，《春在堂隨筆》，卷7，分頁9。

56 (清) 俞樾，〈思古齋雙鈎漢碑篆額序〉，《春在堂雜文·四編五》，全書，總頁2572。

57 同註55，卷1，分頁8-9。

58 陶濬宣，字稷山，號心雲，浙江會稽人。曾主講廣雅書院，後主東湖書院多年，深於金石之學。俞樾「跳山訪古歌爲陶心雲作」見《春在堂詩編·十一》，全書，總頁3285。

爲漢碑所未見：

至碑內諱作「」、子作「」、富作「」、虧作「」、識作「」、嚴作「」，皆漢碑中所未見，然皆奇古可愛。⁵⁹

近人易培基（1880-1937）同樣贊賞〈三老刻石〉，以爲「書法猶存瘦金遺意」。⁶⁰其後沙孟海則強調刻石用筆拙樸，尙未採用雙刀刻法，在書法史上當有一定的地位。⁶¹兩者的看法適可爲俞樾的古拙之說作註解。

俞樾論及書法的文字並不多見，對於〈三老刻石〉的書法，他在理論方面著墨不多，臨池功夫卻相當投入，涵泳其中古拙蘊藉的質素，化爲已有，在書法中吐納出來。例如徐琪（1849-1918）所畫〈俞樾小像〉，上有俞樾光緒七年（1881）隸書題詩一首，⁶²書法參融篆法，古勁含蓄，直與〈三老刻石〉相通。（附圖）這首題詩頗有深意，《春在堂詩編》卻未收錄，先將全作錄下：

南郭先生久忘我，東坡居士爲傳神。青春一去歲復歲，白首重留身外身。
書混沌眉殊可笑，觀恆河面本非真。最憐珊瑚架徐陵筆，貌此尋常行路人。
徐花農庶常爲我寫真，蔣澤山孝廉珍而藏之，皆可笑也，戲書一律。曲園叟。辛巳九月書于俞樓。

題詩的字徑比三老刻石略大，筆法妙在收束波磔，有時似收而微露，如「非」、「叟」二字，末筆皆微見波磔；有時將露卻見收，如「青」、「筆」二字波法蘊藉，予人鋒藏靜穆之感。結體則流露漢篆方整的意趣，用筆中鋒勁挺，讓人聯想到漢金文。當時俞樾六十歲，此種參合篆法的隸書風貌寫來得心應手，顯示涵融日久，可以吐納自然，如「眉」字完全出以篆書結構，依然和諧無間，不覺突兀。在俞樾的大字隸書作品中，同樣讓人感受到這分和諧，如本院所藏〈隸書七言聯〉，（附圖）下聯「華」字，也書以篆書結構，疏朗的布白，與「萬」字的緊密間架，產生虛實調和的效果。倘若再參看七十歲所作〈贈泳舟隸書四條

59 楊鐸，〈函青閣金石記〉，收在《石刻史料新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79），第二輯，冊6，卷2，總頁5026，丁犀訪跋。

60 易培基題〈三老刻石〉藏拓有云：「書法猶存瘦金遺意，趙氏寰宇訪碑載此云無年月，此碑明書建武二十八年歲在壬子五月十日云云，以此知搨叔亦未見原碑也。」筆者按：易氏藏拓（附圖）現爲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，題識中「趙氏寰宇訪碑」乃指《補寰宇訪碑錄》而言。拓本著錄譚怡令，〈譚伯羽譚季甫先生昆仲捐贈文物目錄〉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），頁212。

61 沙孟海，〈陸鳳石手鈔家譜跋〉，收入《沙孟海論書文集》，頁299。

62 徐琪，字玉可，號花農，浙江仁和人。從學俞樾，光緒六年進士，官至內閣學士、署兵部侍郎。所作〈俞樾小像〉，現爲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。

屏》，⁶³ 篆隸參融的方向持續篤定，用筆也更加穩健。〈三老刻石〉的書法，在俞樾多年靈活參變之下，但覺鹽味、不見鹽體，化成俞樾隸書中那分特有的「古意」。

俞樾的書法在當時已有公論，各界前來索求書作，往往指明隸書，如同年勒方錡函云：

春仲奉寄宣州紙一卷求書，不審已曾作得一二否？茲從子赴吳門，復呈上長聯一丈二尺者一副、八尺者一副，求作隸書，字愈大愈雄快也。又八尺者一副，或隸或篆均可。……若不能多得兄書，是謂甘心錯過，他日老去，定以爲憾矣。⁶⁴

又如金石交魏錫曾書函索求隸古，並以「當代無二手」推許俞樾。魏氏可說是俞樾的筆墨知己，已然見及「法書淵古適穆，在建武、永平間」。魏氏函云：

法書淵古適穆，在建武、永平間，當代無二手。私心尚欲求隸古一通，爲勒石計，惜閩無佳紙，已命兒子本存，從江浙間購取。秋涼當界就烏闌，敬求揮翰，惟矜許之。⁶⁵

俞樾廣讀漢碑，隸書取法的對象自然不止於一碑一石，從傳世書蹟豐富的面貌看來，除〈三老刻石〉之外，〈衡方碑〉、〈張遷碑〉以及漢篆〈開母廟石闕銘〉均爲其法乳，而淬煉有成，可以代表俞樾個人風格者，當推上述篆隸參融的風貌。必須留意的是，俞樾積累的不僅是多看多寫的臨池功夫，同時從另一個角度，探求隸體變易的經緯，掌握其間訛變、混同的情形。這些文字學功夫，有助於熟悉隸書結構上的變化，可以引爲書法的憑藉。在〈湖樓筆談〉中，俞樾列舉二十餘字，說明隸體變易可能產生混同，（附表三）以致經典難免隨之訛傳。⁶⁶ 這些字目，可能是俞樾研讀顧藹吉《隸辨》（1718成書）的心得，其出發點原不在於書法，卻無形中轉爲書法的助力。俞樾既有多方面的學養作基礎，篆隸參合之際，方能水到渠成、融合無間。平時俞樾常以隸書寫信札，⁶⁷ 甚至名片也採用

63 〈贈泳舟隸書四條屏〉爲江蘇常州市博物館收藏，收錄於劉正成主編，《中國書法全集·七十六》（北京：榮寶齋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104-105。

64 〈勒少仲觀察書〉，收入《袖中書·二》，全書，總頁5677-5678。

65 〈魏稼孫鑒尹書〉，收入《袖中書·二》，全書，總頁5680。

66 （清）俞樾，《第一樓叢書·九之五》，全書，總頁1309-1310。文云：「竊恐經典中，因隸體混淆以致沿訛千古者，殆不少矣。」

67 （清）俞樾，《春在堂隨筆》，卷1，分頁6，俞樾云：「江艮庭先生，生平不作楷書，雖草草涉筆，非篆即隸也。……余生平亦有先生之風，尋常書札，率以隸體書之。」

隸書，⁶⁸顯示隸書在他心中的比重，也多少透露對自身隸書的認可。

五、結語

俞樾學識淵博，不僅探究漢碑，對於唐碑也有心得，一生過目的碑刻不在少數，倘若加以系統整理，便可得其觀點，知其心力。本文僅就〈三老刻石〉，述介其探索的方向，以至於在書藝方面兼有所得，所見不足之處，仍有待日後繼續求其充實。俞樾以治學為先，書藝乃是餘事，由於學養所至，書藝自然不同凡響，誠如沈樹鏞所云：古來惟積學大儒之字最不可及，以全從書卷得來，不由外造也。⁶⁹

68 同註67，卷5，分頁11，俞樾云：「余名刺作隸書，或以為怪。因學紀聞卷二引宋景文筆記云，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，讀之大喜，書訊刺字皆用古文。然則古人有先我為之者矣，因識之以解嘲。」

69 〈沈韻初中翰書〉，收入《袖中書·一》，全書，總頁5672。

附表一：

著 錄	作 者	刊 行	備 註
東湖叢記	蔣光煦	咸豐 6 年 (1856)	楷釋全文
補寰宇訪碑錄	趙之謙 沈樹鏞	同治 3 年 (1864)	未錄釋文
華延年室題跋	傅以禮	宣統元年 (1909)	楷釋全文。釋文後附語，謂丙寅年即同治 5 年 (1866) 獲贈拓本。
有萬憲齋石刻跋	傅以禮	民國 7 年 (1918)	同上，然於釋文前附語：同治丙寅立夏節識。
春在堂隨筆	俞 懈	同治年間陸續刊行	與周世熊釋文對照
函青閣金石記	楊 鐸		同治 7 年獲贈拓本。 楊鐸藏拓現為北京故宮收藏。
二銘草堂金石聚	張德容	同治 11 年 (1872)	雙鉤原文。拓本得自何澂。 <small>兼石考訂</small>
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	汪 鑾	光緒 1 年 (1875)	楷釋全文。得見楊鐸藏拓。
續語堂碑錄	魏錫曾	光緒 9 年 (1883)	摹寫原文
餘姚縣志	邵友濂等	光緒 25 年 (1899)	載周世熊釋文，附註宋仁山、 俞懶所釋存參。
藝風堂金石文字目	繆荃孫	光緒 32 年 (1906)	僅存目
唐風樓金石文字目	羅振玉	光緒 33 年 (1907)	定末句為「冀副祖德焉」
億年堂金石記	陳邦福		未錄釋文，然考定末句為「蕭 副祖德焉」。
金石彙目分編	吳式芬		僅存目
夢碧簃石言	顧燮光	民國 8 年 (1919) 初版， 14 年 (1925) 增補。	彙輯俞懶、沈樹鏞、魏錫曾、 譚獻、李慈銘、張德容、傅以 禮、楊鐸、羅振玉、徐維則、 陳邦福十一家著錄題記。
八瓊室金石補正	陸增祥	民國 14 年 (1925)	摹寫原文 <small>兼石考訂</small>
定庵題跋	由雲龍	民國 27 年 (1938)	節錄釋文 (自春在堂隨筆轉 錄) <small>略有失誤</small>

附表二：

第一列

周世熊	三老諱通。字小父。	庚午忌日。	祖母失諱。字宗君。	癸未忌日。
俞 橝	少			
傅以禮	小			

第二列

周世熊	據諱忽。字子儀。	建武十七年歲在辛丑。	四月五日辛卯忌日。
俞 橝			
傅以禮			

周世熊	母諱捐。字謁君。	建武廿八年歲在壬子。	五月十日甲戌忌日。
俞 橝	□		
傅以禮	謁		

第三列

周世熊	伯子玄。曰大孫。	次子但。曰仲城。	次子紓。曰子淵。
俞 橝	玄		
傅以禮	元		

周世熊	次子提餘。曰伯老。	次子持侯。曰仲雍。	次子盆。曰少河。
俞 橝			盈
傅以禮			盆

第四列

周世熊	次子邯。曰子南。	次子土。曰元土。	次子富。曰少元。
俞 橝		士 士	
傅以禮			

周世熊	子女。曰元名。	次女反。曰君明。
俞 橝	无	期
傅以禮	无	期

第五列

周世熊	三老德業赫烈。克命先己。	汁稽履仁。	難名兮。而右九孫。
俞 橝		化	
傅以禮		仁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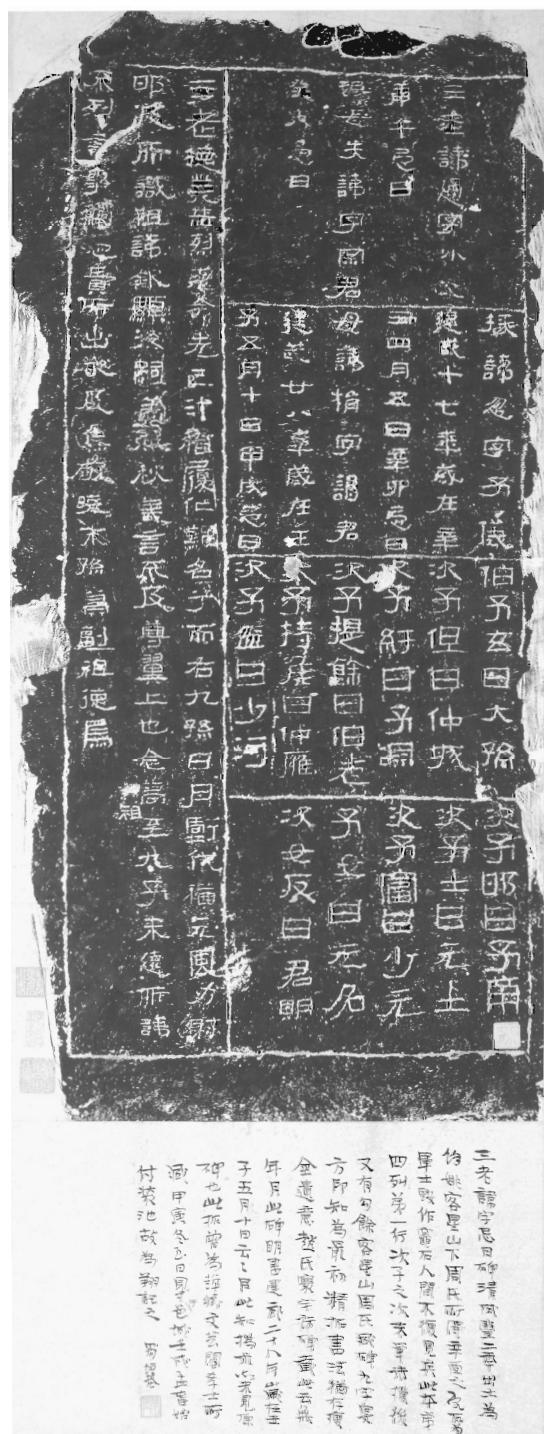
周世熊	日月虧代。猶元風力射。	邯及所識祖諱。欽顯後嗣。蓋春秋義。
俞 橝		
傅以禮	□	

周世熊	言不及尊。翼上也。念高祖至九子未遠。所諱不列。言事觸忌。
俞 橝	
傅以禮	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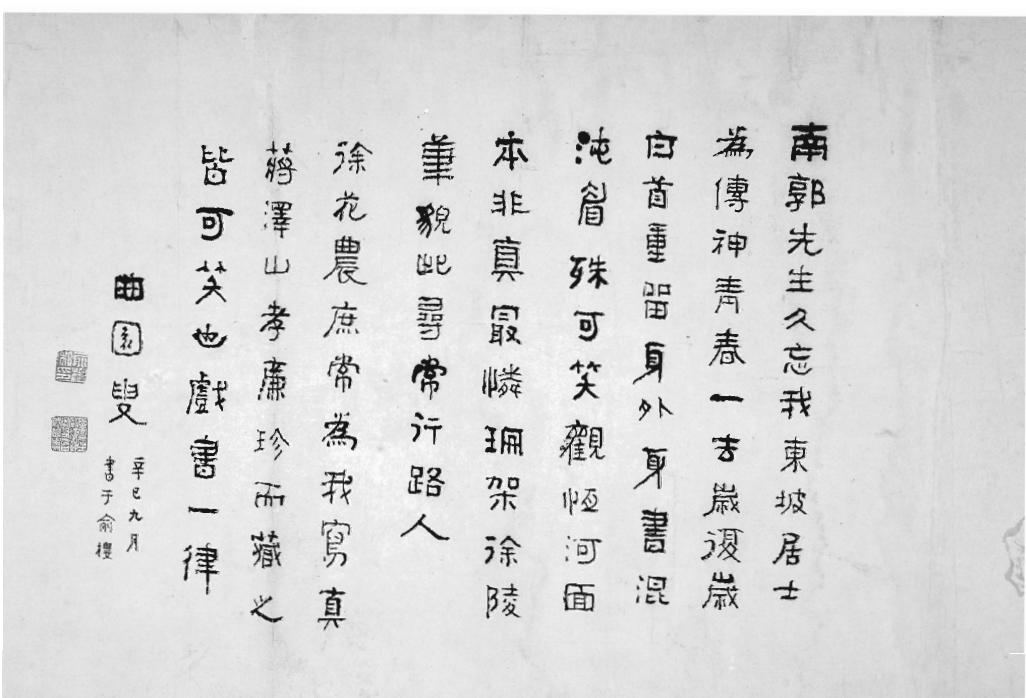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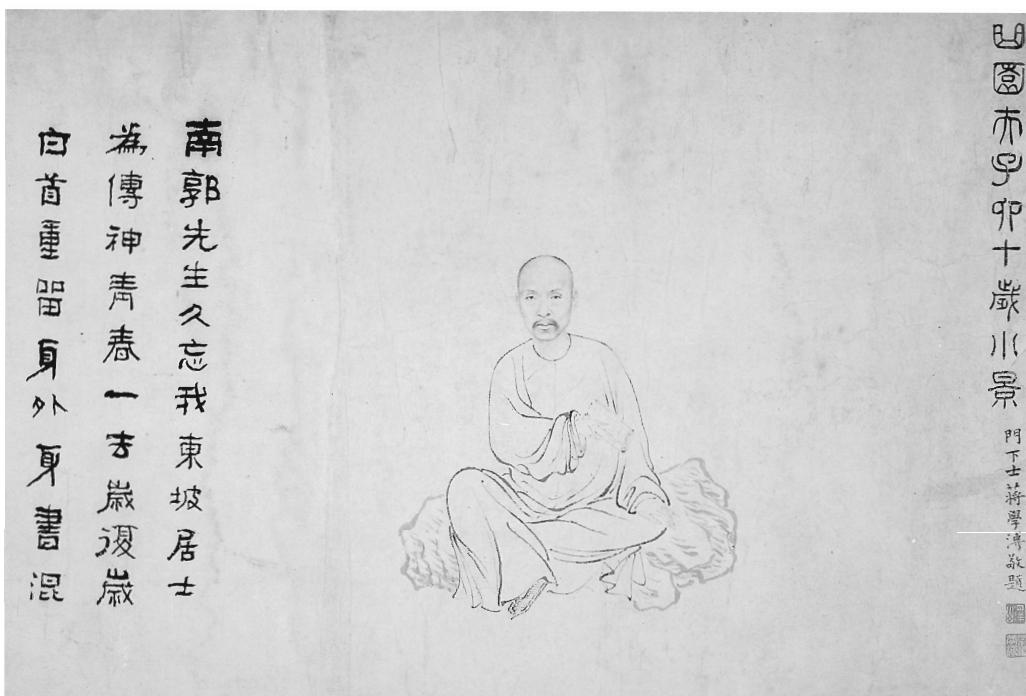
周世熊	貴所出嚴及焦。	敬曉末孫。	□副祖德焉。
俞 橝	□及□		□
傅以禮	嚴及焦		□

附表三：

碑名	原字	可能混同字	碑名	原字	可能混同字
夏承碑	東	秉	孔耽神祠碑	成	求
	東			成	
李翊夫人碑	眉	脣	議郎元賓碑	朋	多
	眉			朋	
孫叔敖碑	塗	渝	太尉公墓中畫像	太	伏
	塗			太	
嚴發碑	身	牙	校官碑	介	爪
	身			介	
苑鎮碑	身	耳	唐扶頌	奮	舊
	耳			奮	
北海相景君銘（陰）	幹、驥	午、駿	徐氏紀產碑	冠	寇
	干駿			冠	
韓勅碑（側）	淳	淳	嚴訴碑	貌	類
	淳			貌	
張納功德敘	責	責	張遷碑	雪	虐
	責			雪	
魯峻碑（陰）	殷、王	殷、壬	楊統碑	克	官
	殷王			克	
魯峻石壁畫像	鮮	解	金恭碑	兆	水
	鮮			兆	
吳仲山碑	彫	割	周憲功勳銘	億	促
	彫			億	
衡方碑	寮	賚	陳寔碑	美	筭
	賚			美	
鄭固碑	牙	耳	韓勅後碑	耳	瓦
	耳			瓦	
唐公房碑	房	防	筆者按：本表隸字取自顧藹吉《隸辨》		
	房				



三老刻石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徐琪 俞樾小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俞樾 隸書七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